

G数据透析

日均新增企业1.51万户

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陈晨

一数据回放 刚刚过去的2016年,全国新登记企业552.8万户,同比增长24.5%,平均每天新登记1.51万户。截至2016年年底,新登记市场主体1651.3万户,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1月18日,国家工商总局发言人于法昌在介绍2016年全国市场环境形势相关情况时表示。

新登记企业除大幅增长外还表现出哪些结构特点?这些企业的活跃度怎样?企业退出情况如何?于法昌进行了分析。

记者:过去一年,我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在大幅增长的同时,结构方面表现出怎样的“含金量”?

于法昌:去年,新登记注册企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趋于回暖。服务业新登记企业446万户,同比增长24.7%,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80.7%。截至2016年年底,服务业实有企业1972万户,占企业总数的76.0%,比上年年底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仍是大众创业的热门行业,同比增速较高。

制造业新登记企业增长较快,全年新登记制造业企业44.6万户,同比增长16.9%,与2015年增速5.8%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其中,医药制造业,家具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显著。

记者:新登记企业在登记注册后“成长”得好不好,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跟踪统计?

于法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百县万家新设小微企业周年活跃度调查,通过对2015年四季度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周年调查问卷分析表明,

厦门翔安:

“金山银山”让路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马跃华

“周末去翔安深呼吸吧!”这句话已经成为不少厦门人的口头禅。从最近一个季度厦门六个区的空气质量排名来看,翔安区每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据了解,翔安区不仅获得“国家生态区”称号,全区四镇一街也全部获得国家生态镇命名,实现国家生态镇全覆盖。目前,翔安正追求2020年建成绿化覆盖率达到40%的目标。

翔安在各个工地用上了降低工地扬尘的微灌雾喷系统。在厦门,翔安是最早使用这个系统的,如今它已经广泛应用于厦门的工地。不仅如此,翔安还在厦门率先引进雾炮车,从每天早晨6时开始,雾炮车就要整装待发,沿着翔安东路、翔安南路、洪钟大道等扬尘易产生的主干道,连续工作18小时。环保专家预测,雾炮车运行后,可将空气中的PM10和PM2.5含量降低15%到20%。

脏乱不堪曾是翔安溪东溪流古宅溪的尴尬。以前,古宅一带有170多家养猪户,大量污染物直接排进古宅溪,周边臭不可闻。自从生猪退养后,古宅溪一改往日容颜,不仅没有任何异味,水质也变清澈了,一公里多长的生态湿地核心区已现雏形。

如今,从洋唐保障性居住区前往翔安早溪公园休憩的人们越来越多,公园主体部分的早溪不仅有转输、滞留、下渗雨水的功能,还起到净化、净化中水的作用。这是翔安海绵城市建设的一部分。

翔安是厦门唯一一个获得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双试点的新城区。现在,城市能够像

小微企业发展总体良好。

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新设小微企业表现较为活跃,周年开业率达70.8%,比2015年二季度、三季度提高1.51个百分点。新设小微企业中,初次创业企业占85.8%。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开业率最高,达78.3%,东北地区最低,为61.5%。二是近八成开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开业企业近半实现纳税,创新和触网小微企业盈利比例高。三是新设小微企业带动作用显著,开业一周年,户均从业人员从开业时的6.6人增加到7.7人。四是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偏好现代服务业,经营活动较为积极。

记者:每天全国有许多新企业“诞生”,也必然有一些企业“死去”,能介绍一下去年企业的退出情况吗?

于法昌:去年我们加大了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力度,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在全国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未纳税企业。2016年,全国共注销企业138.6万户,同比增长70.2%,其中吊销41.1万户,是上一年的15.8倍;注销97.5万户,同比增长23.6%。

从具体行业看,去年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6个产能过剩行业共注销企业3063户,同比下降39.3%;吊销2375户,增长3.3倍,其中钢铁和煤炭分别增长4.7倍和2.2倍。但受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产能过剩行业新登记企业小幅增长,其中煤炭和钢铁行业分别同比增长15.4%和5.2%。

此外,“去产能”“去库存”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去库存政策及房地产销售火热影响,房地产业新登记企业快速增长,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而在金融监管不断加强及去杠杆政策效应影响下,金融业新登记企业则发展持续趋缓,呈现加速下降趋势。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对于体量巨大的中央企业来说,投资是最重要的经营活动,也是风险最大、最复杂、最难决策的事情之一。

长期以来,央企投资既存在“管得过多”的忧虑,也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风险。如何有效平衡效率与安全的关系,达到“既放权又不滥用权”的目的,国务院国资委1月18日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对央企投资重新划出了监管红线。

制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中央企业的投资主体多、项目多、规模大,投资监管难度大,风险大,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监管体系,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办法》提出,中央企业投资要进一步聚焦主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大专项任务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产业链高端集中。

“一方面,主业是央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只有突出主攻方向,做强做实做精主业,才能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分布在传统产业中的国企,也会分户核定企业的非主业投资比例,为企业转型发展留出空

央企投资,如何划好监管红线

本报记者 温源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表示,企业的主业是动态变化的,今天的朝阳产业可能是明天的过剩产业,因此需要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差异化管理,不能搞一刀切。”

与以往监管要求不同,新办法提出建立中央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制度,对央企投资项目按类别划分为“禁止类”和“特别监管类”,列入“禁止类”的投资项目,中央企业一律不得投资;列入“特别监管类”的,则需要审核;负面清单之外的其他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责任。

“负面清单为央企投资行为划定了‘红线’,也是国资监管的底线。”在国资委规划局局长邓志雄看来,负面清单讲清楚了中央企业不能投什么,“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不符合企业投资决策程序和管理制度的、资本金低于国家相关规定要求的投资项目都列入‘禁止类’”。

投资监管覆盖全过程

有的投资金额庞大,运转周期长,个别企业存在“重决策、轻跟踪”的问题;有的投资审核层级过多,往往等获批后已然错失良机;有的投资失误事后问责不带来,带来权与责不相匹配……央企投资中的这些“痼疾”需要更加科学规范的“药方”加以诊治。

《办法》将中央企业的投资监管划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按照事前规范、事中加强监控、事后强化问责的思路,从过去以事前管理为主转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并重,实现对投资全过程监管。

“有的央企投资金额要成百上千亿元,项目运转周期长达几十年,这期间市场形势会发生巨大变化,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项目失败。这就要求投资决策不能一决了之,一定了之,必须随时跟踪项目变化进行再评估、再决策,建立投资全过程风控体系。”邓志雄指出。

《办法》提出,央企要对投资决策实行统一管理,向下授权投资决策的企业管理层次原则上不超过两级。在投资回报上,办法要求各企业设定投资收益底线,制定及时止损退出机制,并将投资回报率低于一定水平的投资项目列入“禁止类”项目。

引入多元资本 防境外风险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央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业务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元。

黄丹华指出,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经验相对不足,对国际规则的熟悉和运用不够,对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有待提高,再加上境外投资的市场竞争激烈,国别差异较大,投资监管环境不同,境外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法律、社会、

安全等各类风险。

《办法》对央企境外投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明确规定央企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此外,在股权结构上要求境外投资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入股;对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要在项目决策前委托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专项风险评估等。

“相比境内投资,央企境外投资的风险大,矛盾多,形势更为复杂。事实证明,央企实施境外主业投资,往往成功的概率较高;进行非主业投资的,由于缺乏主业的比较优势,在识别和处置风险方面处于劣势,容易导致投资失败。”邓志雄告诉记者,境外投资防控风险的有效之策就是引入多元化的民间资本、当地投资者、国际投资机构等入股,从而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散投资损失。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1月18日,南京地铁4号线开通试运营。该工程全长33.78公里,设有18个站点,最高运行速度为100公里/小时,列车主体颜色为紫色。

王新摄/光明图片

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势总体趋稳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张翼)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房地产市场持续呈现积极变化。

“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施策调控政策以来,政策效果明显,房价快速趋稳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指出。2016年12月份,1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降幅在0.1至0.4个百分点之间;2个城市环比持平;广州市环比上涨0.7%,但已连续三个月涨幅回落。

初步测算,2016年1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0.1%转为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0.2%,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房价总体略有上涨,市场继续保持稳定。从同比看,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进一步回落。

“深化之年”走好“深化之路”

——经济学界权威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陈晨

——甄别、判断,大量中小企业只能在严格环保准入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去实现。走回头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找不到一个真实科学的价格体系。”

“煤炭、钢铁去产能,为什么在最近这半年有部分地区又出现反弹,走回头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找不到一个真实科学的价格体系。”复旦大学RICE智库成员、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刘宇说,“通过市场主体的竞争开展创新,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形成真实的价格体系,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需要重点着力的地方。”

与此同时,法治的手段将更加被强调。“我们看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这显然是在问题导向之下的长远考虑和着眼全局的重大制度建设部署。今后,民法典可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一个夯实现代市场体系产权基石的里程碑。”贾康说。

更强调市场、法治的办,更强调技术标准的引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至今,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积极进展。部分与会专家指出,不能把去产能简单理解为减少产量。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上,2016年已经明确提出“三去一补”。“三去一补”并不是代表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内容。在推进过程中,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应把握科学的指导方针。去产能,怎么理解?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在讲去过剩产能,真正的实质问题是去落后产能。”在贾康看来,仅仅依靠下达行政性指令的办法效果有限。比如,究竟把哪些企业作为去产能的对象?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去

与会专家们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确定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并且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阐述,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抓住供给侧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改革,是克服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刘伟说。

“抓住供给侧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改革,是克服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刘伟说。

“抓住供给侧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改革,是克服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刘伟说。

“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加快立法层面的跟进,是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攻坚的问题。”

身居金融改革一线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总裁苏宁指出,大宗商品市场聚集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各方面要素。现在很多交易所忽略了业务的本质,忽略了怎么去服务实体经济,“这就需要从国家统一层面科学规划,加强监管,同时进一步加快立法,可以为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更大空间。”

给实体经济更多源头活水,迎接创新的“爆发期”

“强调市场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把市场环境规范起来,真正做到开放、有序、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要使市场供给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就要把更多生产经营自主权、收入分配等相关权力下放,增强企业活力,加强追责制度,严格产权保护,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另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放管服”的改革坚持下去,放开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改进政府面向社会、面向企业的优质服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认为,产业升级对创新产生巨大的需求,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要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从目前观察来看,中国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创新的“爆发期”,“把创新作为重要引领,我们就有信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强调市场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把市场环境规范起来,真正做到开放、有序、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要使市场供给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就要把更多生产经营自主权、收入分配等相关权力下放,增强企业活力,加强追责制度,严格产权保护,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另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放管服”的改革坚持下去,放开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改进政府面向社会、面向企业的优质服务。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70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到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被赋予了新内涵,有了新要求。

“抓住供给侧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改革,是克服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刘伟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重要理论成果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阐述,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杜飞进在此次高端对话中指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机遇,可以从多个观察视角或维度来思考:一是从经济社会规律的角度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的科学思维;二是从全球价值的维度考量中国方案、中国实践;三是从解读中国实践的维度来构建中国理论的学科体系。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以学理为支撑对我们科学决策、政策设计的优化和提升。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供给问题,必然从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入手,寻求最大制度红利之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这是运用马克思